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A2
1-2,53

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第五十三卷

1893—1922年

人民出版社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张坚、姚以恩、王义琏、周文馨、李越常。

参加资料编写工作的有：李洙泗、林扬、张瑞亭、刘方清。

参加编辑工作的有：许易森、韦清豪、江显藩、李京州、李桂兰、薛春华、阎殿铎。

全卷译文由张企、何宏江审订。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第 五 十 三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 大 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75印张 570,000字
1988年10月第2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600

ISBN 7-01-000147-2/A·48 定价 9.90 元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 例

1. 书信卷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篇或组的写作或签发时间编排并加编号。

2. 在正文中，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 1918年2月14日以前，在俄国写的书信的日期为俄历，在国外写的书信则为公历；从1918年2月14日起，所有书信的日期都为公历。

4. 在正文中，凡文献原有的或该文献在列宁生前发表时使用过的标题，其左上方标有五角星☆。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写信人的原注。

6. 著作卷《凡例》中适用于书信卷的条文不再在此列出。

前 言

本卷收载列宁 1893—1922 年间给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乌里扬诺娃、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姐夫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叶利扎罗夫、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以及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书信和电报。

列宁 1893 年离开家庭，没有随家人从萨马拉迁居莫斯科，而独自来到俄国的政治中心彼得堡从事革命活动。1895 年曾到国外旅行数月，结识了普列汉诺夫等劳动解放社领导人。回国后不久，1895 年底被捕入狱。1897 年春至 1900 年初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流放期满后出国，开始第一次流亡生活，从 1900 年春至 1905 年冬先后居住在德、奥、英、法和瑞士等国。1905 年 11 月回彼得堡。1905—1907 年革命失败后，1907 年底再度出国，辗转侨居瑞士、法国、奥地利、波兰等国，还到过意大利和丹麦。1917 年 3 月回国直接领导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斗争。

本卷收入列宁家书 279 封。其中大部分是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和侨居国外的 1900—1902 年、1908—1910 年、1912—1914 年间写的。这些信件反映了列宁为创办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所作的努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以及列宁在波兰居住期间

的活动。由于沙皇专制的警察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等原因，列宁还有很多家书没能保存下来。

本卷的大部分书信曾在1924年、1929年和1930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和《列宁文集》俄文版中发表过。1930年由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编成《列宁家书集》出版，1931年和1934年两次再版。

本卷卷首收载玛·伊·乌里扬诺娃为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所作的序言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为1931年、1934年两版所写的《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书》一文。这两篇文献对列宁家书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

本卷所收的列宁家书，比《列宁全集》第1版第37卷增加了6封，其中4封是第一次发表的。这4封是：1904年7月20日在瑞士山地旅行时写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明信片，1921年和1922年写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两封便函和1921年4月给德·伊·乌里扬诺夫的电报。另外两封，即1918年2月底和3月8日之间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便函。1919年10月和1920年9月7日之间给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便函，是第一次收进《列宁全集》的，以前曾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和第35卷发表过。

本卷中有16封信是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共同写的。其中有些是列宁写的，克鲁普斯卡娅加了附言；有的则相反。

本卷《附录》中收载从莫斯科宪兵局案卷中发现的列宁6封家书的摘录。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列宁的母亲、姐姐和妹妹的56封信也编入《附录》，其中1904年8月19日和1915年4月17日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两封信是《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新发表的。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是对列宁家书的宝贵补充。这些信绝大多数是在西伯利亚流放和侨居国外时写的。它们生动地描述了克鲁普斯卡娅同列宁在一起的生活、工作、休息以及与革命同志会晤时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到列宁当时的生活环境、家庭中的事情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本卷所收的列宁家书的原文,除了4封给母亲和姐姐的信按宪兵局案卷里的副本刊印、1919年7月10日给克鲁普斯卡娅的电报按打字稿刊印以外,都是按手稿刊印的。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本书所收的书信，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给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①，包括的时期是从1894年至1917年^②，即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革命活动的最初几年起，至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止。这个将近25年的时期是我们党建立、成长的时期；而在这光荣的25年当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是这个党的领袖，他领导着党，培育着党。他整个一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度过的，他个人的一切也都是同这个斗争、同为无产阶级事业所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虽然现在出版了《列宁全集》，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包括科学研究著作和通俗读物)，但是关于列宁的鲜明的多

- ① 不过，“为了不重复起见”，这些信的内容通常都是给我们全家看的，至少是给当时住在一起的亲属看的。
- ② 这里不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间的家书(见1929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3、4、5、6、8期)和1896年的家书。189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监禁在彼得堡的拘留所时(从俄历1895年12月9日至1897年1月29日)，差不多经常同母亲和姐妹们见面，所以同他们的私人通信很少(见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一文(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和附在该文后面的189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两封信)。从1905年11月至1907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彼得堡或芬兰，经常同家人见面，差不多没有给他们写过信。此外，还有好些给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特别是当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住在国外的那几段时间的信将另行发表。(玛·伊·乌里扬诺娃所提到的列宁的书信已编入本卷。——编者注)

方面的个性,至今还描写得很不够,或者说几乎完全没有得到描写。

向读者提供的这些书信部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这些信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方式、他的习惯和爱好、他对人的态度等等。我们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因为这些信件远不是他在上述时期所写的全部家书。由于家庭经常迁来迁去,同时我们家里的人经常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遭到搜查和逮捕,他的许多书信有些是落到警察手里没有退还^①,有些出于其他原因而丢失了。在邮寄过程中书信丢失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因此,往往同一个问题连续在几封信中重复提到。此外,这些信件还带有沙皇时期警察制度的烙印。不错,当时我们凡是通信谈工作(报告革命事件、党的生活等等),都是秘密进行的,通常是用化学方法写在书籍和杂志里寄给“清白的”局外人。^②但是个人生活同革命工作的联系极为密切,所以私人的合法通信无疑也会受到警察制度的严重影响而大打折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沃洛格达给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当时她流放在那里)去信时就曾这样写过:“在我们(特别是你和我)所处的情况下,要随便写信是很困难的。”^③

不仅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是这样,同家里其他人写信也都是这样;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们不仅是亲属关系,而且观点相同,信仰相同。他们大家(包括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

① 例如,我们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6封信的摘录,这些摘录作为“物证”附在莫斯科宪兵局案卷里。我们已把这些摘录编入附录。(见本卷第477—478页。——编者注)

② 当时在俄国保存这些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在国外留下复制件的一部分信件保全了下来。

③ 见本卷第439页。——编者注

马·季·叶利扎罗夫在内)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属于党的革命派,他们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十分关心党的生活,喜党之所喜、忧党之所忧。就连我们的母亲,虽然她生于1835年,90年代末我们家的人遭到特别频繁的搜查和逮捕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的人,也十分同情我们的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者的全部合法信件都要受到秘密检查,所以,在谈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告知某封秘密信件已经收到以及询问熟人的情况等等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暗语、暗号之类的东西。

读者将会看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寄给母亲、姐妹或弟弟的信中几乎不提什么人的姓名,因为如果在信中提到某人的姓名,就会给那人招来麻烦。当然,我们是丝毫不愿意给任何人带来哪怕一点点麻烦的。如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中还能看到一些同志和熟人的名字甚至姓氏的话,那只是因为警察局通过种种情况(同案流放,同校学习等等)反正已经知道我们同他们认识,或者纯粹是事务性来往(出版人、书商等等的姓氏)。为了避免在信中提到具有一定合法身分的熟人的姓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想谈到他们,问候他们时,总是用绰号,或者用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或事件作个暗示。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称为“历史学家”(因为他有一些历史著作);有一个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他有频繁的信件来往。^①

^① 可惜这些来往信件保存下来的只有1909年12月16日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12—216页。(此处指俄文第2版,列宁同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来往信件保存下来的有两封——1909年12月2日一封信,12月16日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编著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问候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时流放在沃洛格达的瓦·瓦·沃罗夫斯基时写道：“向波兰朋友们问好，并且希望他们能尽力给以帮助。”^①“中国旅行家”^②是指阿·巴·斯克利亚连科，他当时在满洲的铁路上工作；“去年同我们一道划船的那位先生”^③，是指维·亚·列维茨基；等等。

在提到邮寄秘密出版物、秘密通讯稿和里面用化学方法写了信的书籍时，也要用隐喻。

1900年12月底，本文作者曾托出国的格·波·克拉辛把《社会革命党宣言》带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不被发现起见，就把宣言夹在一本照片簿里。捎去的这件东西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高兴，他在1901年1月16日的信中写道：“多谢……给我寄书，尤其多谢她托表兄从维也纳转寄来非常美丽而有趣的照片；我希望能经常收到这样的礼物。”^④

顺便说说，《火星报》及其他秘密出版物寄往俄国的时候，信封上写的是“清白的”、合法的通讯处。我们还利用这些通讯处作为自己接收书刊的地方。有时就在合法的信件里通知某个包裹已经寄出，以便我们能及时向收件人查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面这一段话（1900年12月14日的信）显然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记得在9日给你寄去了一个你喜欢的小玩意儿。”^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1916年2月8日的信中写道：“沃洛佳收到你

① 见本卷第42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35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256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242—243页。——编者注

⑤ 同上，第239页。——编者注

那封长信非常高兴。说不定你还会来信的。”^①我们的合法信件从来都写得不长，这封信又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写的，当时我们通信主要用明信片，而且是挂号明信片（因为许多信都寄丢了），所以上面这一段话显然是指写在书里寄去的秘密信。

1900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侨居国外之初，还不知道是否能在国外站住脚，为了保密起见，当时他就没有把他本人的地址告诉我们；当他住在瑞士或慕尼黑的时候，我们给他写信都寄到巴黎或布拉格。例如，他在1901年3月2日的信中写来一个新地址的时候附带说：“我已随房东迁居。”^②弗兰茨·莫德拉切克（我们的信都寄给他）当时的确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继续住在慕尼黑的老地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办事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一切开支尤其是自己的开支极为节俭。看来这些品质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性格在许多方面都象母亲。而我们的母亲按其母系说是德国人，这些性格特点在她身上是很突出的。

从1895年10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来信^③中，可以看出他用钱是多么节约，是多么克己。

“现在我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记起流水账来了，看看我究竟要花多少钱。结果，在8月28日到9月27日这一个月里，一共花了54卢布30戈比，其中还不包括买东西的钱（近10卢布）和我可能

① 见本卷第545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49页。——编者注

③ 指1893年10月5日的信（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要办理的一件诉讼案的费用（也是近 10 卢布）。当然，在这 54 卢布中，有一部分不是每个月都要花的（套鞋、衣服、书籍、算盘等等）；但是，即使除去这部分（16 卢布），我仍然花得太多了：一个月用去了 38 卢布。显然，我过得不够节俭，例如单是乘有轨马车一个月就花了 1 卢布 36 戈比。大概对环境渐渐习惯以后，我就会少花些钱的。”

果然他就节省起来，特别是当他自己没有收入，不得不接受“救济”（这是他对母亲贴补给他的款项的叫法）的时候。1893 年住在彼得堡时他自己俭省到连《俄罗斯新闻》^① 都没有订，而是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两个星期以前”的。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找到工作以后，可能要订一份。”^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都保持着这个特点。不仅是当他在俄国没有收入的时候，也不仅是当他侨居国外找不到出版人出版自己的著作（例如他的《土地问题》一书就整整放了十年，直到 1917 年才问世），有时简直陷入危急境地的时候（1916 年 9 月他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信^③ 就是一例），而且当他的物质生活完全有了保障，也就是说在 1917 年革命以后，他的这个特点也非常突出。

不过，有一个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难节约，那就是在书籍方面。为了写作他需要阅读各种书籍，以便熟悉国内外种种政治、经济和其他情况。

他在 1895 年 8 月 29 日从柏林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使我大为吃惊的是，我发觉我的经济又‘发生困难’了：买书等等的

① 《俄罗斯新闻》是当时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中最正派最吸引人的一家报纸。

② 见本卷第 3 页。——编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7 卷。——编者注

‘瘾头’这样大，天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①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尽力减少开支，主要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去看书，而且这样还可以使他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得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环境，摆脱人来人往的干扰和使人疲惫不堪的、没完没了的谈话，因为侨居国外的人大都对异乡不习惯，感到苦闷，都喜欢找人谈心。

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远远不仅限于在国外时才利用图书馆来工作，他住在俄国时也同样如此。他在彼得堡的时候曾写信告诉母亲，说他对自己的新居很满意，因为这地方“离中心区也不远（例如，到图书馆只要走15分钟）”。^②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甚至利用在莫斯科逗留的不多几天的机会到鲁勉采夫博物院去工作。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待通航期开始以便前往米努斯克县的时候，他也曾在尤金图书馆研读书刊，虽然为此每天要跑上差不多五俄里。

在流放地是根本谈不上图书馆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们设法把图书馆的书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们试过几次，但是邮寄时间太长（来回要将近一个月），而图书馆借书是有一定期限的。

但是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还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他在1914年2月11日给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③中写道：“关于1905—1908年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汇编，请不要买了（用处不大，且太贵），从图书馆（律师公会图书馆或国家杜马图书馆）给我借一本寄来看一个月好了。”

① 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页。——编者注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信的摘录是我们从警察司的案卷中找到的。（见本卷第432—433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外时也经常利用图书馆。在柏林时，他曾在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在日内瓦时，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心爱的“俱乐部”（“读者协会”），这个“俱乐部”有一个图书馆，要在这个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必须报名加入“俱乐部”并交一定的会费（会费当然不多）。在巴黎时，他在国立图书馆进行研究，不过他说这个图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糟”；在伦敦时，他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只有在慕尼黑时他才深以“这里没有图书馆”为憾事。另外就是在克拉科夫时他很少利用图书馆。他在1914年4月22日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写道，“这里（在克拉科夫。——玛·乌·注）……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也几乎没有机会去……”^① 当时他要办报（《真理报》），要同来到克拉科夫的同志们（到克拉科夫来的同志比到法国或瑞士去的要多得多）打种种交道，要领导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工作，要开党的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等等，这些工作消耗了他很多精力，使他拿不出很多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即使在这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信说：“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那里工作效率高，又有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帝国主义战争初期在加里西亚被捕获释以后又到了瑞士，他来信说：“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③ 后来他又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从伯尔尼到苏黎世，“到这里的图书馆来进行一些研究”，因为这些图书馆，据他说，“比伯尔

① 见本卷第44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440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443页。——编者注

尼的好得多”(与此同时,他还紧张地做政治工作,党的工作;不久前发表在《列宁文集》第11卷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时期同卡尔宾斯基和拉维奇两同志的通信^①明显地反映了这个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侨居国外时虽然在阅读、浏览外国书报杂志方面条件很好,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但是俄国书籍却总感到非常缺乏。他在1902年4月2日的信中写道:“在这里我可以很容易地弄到德文书,德文书不缺。这里所缺的就是俄文书”。^②他在1900年4月6日的信中也写道:“很少看到新书。”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外由于手边经常缺少所需要的书籍,他的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因此他在家书中常常要求家里的人给他寄工作所需的各种书籍(统计材料、有关土地问题、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新书、杂志和小说。从这些信中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某段时间内对哪一类书籍感兴趣,他参考这些书籍写了哪些著作。

在这些书籍中,他特别重视各种统计汇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统计,非常重视“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③,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从他为这些著作所写的草稿、所作的摘录和计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有一篇没有完成,尚未发表的,论述“民族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民族运动和国际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文章《统计学和社会学》^④(署名:普·皮留切夫,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便于出版这本书而用的新笔

① 这些通信的一部分已编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66页。——编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编者注

④ 同上,这篇著作已于1935年发表。——编者注